

中国是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

——柯布生态文明思想解读

冯石岗,王柔健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摘要:柯布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面对生态危机,他在对西方现代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实现生态文明的必备条件,建构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倡导共同体经济的生态模式。柯布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寄予厚望,曾多次提出“中国是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中国人民懂得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中国传统文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中国的政体和政策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柯布;生态文明;共同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5-0050-04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5.010

China is the Most Potential Pla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obb's View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ENG Shi-gang, WANG Rou-jian

(College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Cobb criticized western modern economic theory in relation with ecological crisis, proposed a prerequisite to achie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ugges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advocated an ecological model of economic community. With high expectations for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e has insisted many times that China is the most potential pla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cause Chinese people understand the possibility of enormous social refor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provide unprecedented developing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government and policies of China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obb;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nomic community

柯布教授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领袖,非常著名的过程哲学家,他是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他与著名学者大卫·格里芬共同创办了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以推进过程思维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运用。该研究院现已成为世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中心。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一直关注着生态问题。1969年以前,柯布的思想主要是利用过程哲学的思维去阐释基督教的信仰。1969年以后,柯布的思想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他认为基督教的独特优势应当是引领社会发展并帮助人类应对挑战,于是他将生态问题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1972年,柯布出

版了专著《是否太晚?一种生态理论》,这部著作是柯布思想转向过程生态神学的重要标志,开创了生态神学的新范式。后来,柯布又撰写了大量关于生态问题的文章和书籍,其中包括与查尔斯·柏奇合著的《生命的解放》。在该书中他主张,首先需要在观念上从机械论和二元论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把哲学的广度、科学的严格以及各学科的知识集合起来,从微观到宏观建构一个解释生命的复杂性和关联性的理论体系,将生态学折射到对人类社会的思考中,包括从分子生态学到经济可持续性、环境保护、社会正义等方面的问题。1989年,柯布与赫尔曼·达利合著《For the Common Good》(中文书名为《21世纪生态经济学》),表明其开始关注生态经济学。书中认为,经济发展是当今社会的重心,而生态问题的解决以及公正的、人人参与的、可持续的社会的建立则需要改革当今的经济政策。柯布在1992年后陆续出版《可持续性》、《绿色GDP》(与克利福德·柯布合著)、《后现代精神》(与大卫·格里芬合著)等著作。时至今日,生态问题依然是柯布最关注的问题。

柯布很早就提出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的著名论断,近年来更是发表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形式》《生态文明的必要性》《中国的独特机会: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等论文,旨在说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景十分光明,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实现生态文明可能性最大的地方。

一、柯布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背景

从现实背景来看,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科技发展十分迅速,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现代工业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造成了森林覆盖面积减少、草原退化、水土破坏、土地沙漠化、气候异常等严重后果。生态危机问题使柯布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成为现实需求。大卫·格里芬曾指出:“这种危机的结果,并不是令我们感到不舒服,而是会毁灭人类文明。”

从理论背景来说,怀特海过程哲学是柯布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怀特海是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学家。他认为:宇宙是由连续不断的经验的事物与独立存在的“永恒客体”相结合所构成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是由过程阶段中许多不可分割的部分连接而成的一个整体。怀特海创造和

谐和自由的模式恰好验证了有机性和整体性。柯布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对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挥,以过程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观,也受到了高度关注。

从宗教背景来看,1970年代以前,基督教神学是一种历史神学,1970年以后,在其基础上诞生了生态神学。此后,基督教在当代的发展有了一种生态学的建构,生态神学表现为基督教视野的拓展——从人类社会到自然界,它把关切的目光投向了自然界或者整个生态系统。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柯布认为生态神学应当能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一种创造性的视角。

二、柯布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柯布批判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关键,个人主义思维解构了人与自然之间紧密的联系。柯布认为人应当是共同体中的人,这是一种生态主义的思维方式。柯布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是发展生态农业,其本质在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倡导的是共同体经济的发展。

(一) 西方主流经济学导致生态危机

柯布指出生态危机和一系列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应当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及资本主义制度在作祟。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大的问题是现代机械论和个人主义思维方式,导致其对具体现实作抽象的理解,怀特海称之为“具体误置的谬误”。经济规律面临的真正危机在于经济规律与产生它的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被经济学家所忽视。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认为经济活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可以再在抽象的过程中被忽视掉。正是这些被忽视的、外在的东西对经济的抽象过程起着修正的作用,因此需要我们重构经济学中的某些基本概念,包括涵盖其间被当作是外在的东西^[1]。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理论背后有一种个人主义思维,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独立存在的,彼此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2]。而在柯布看来,人是亲身体验的人,不能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纯粹的外在的东西,事实上每一个个体都是共同体中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是关系网络中的人。关系也产生了生态主义的思维方式,每一个个人的福祉都与自然环境相联系,人类共同体是生态系统下的小共同体,其间每个成员的真正幸福都依赖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共同体的健康发展^[3]。

(二)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是发展生态农业

柯布认为生态文明的基础是农业,因此应当首先关注农村社会。农业的机械化显示科技的进步,但是却不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工业化、机械化表现出人对自然的疏离。以石油为燃料的机器替代人,造成空气污染;化学除草剂和杀虫剂破坏土地的活力,并且杀死大量的昆虫^[4]。显然,这种方式难以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的基础应当建立在生态农业之上。生态农业意味着重视农民对国家的价值,重视生态系统自然生成的过程,重视土壤及生物的养护,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发展生态农业,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柯布结合中国生态状况,提出生态农业是中国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实现生态文明必须具备的条件

任何国家实现生态文明都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一是文化的或者精神的需求;二是关注全民福祉;三是适度人口^[5]。首先,文化或者精神的需求会为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指明方向。柯布列举了中国和西方的例子,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被工业现代化思想所支配,而在中国却依然保留着现代性与自然性相结合的传统文化情结。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唤醒了生态意识,必将引领中国走向生态文明。其次,关注全民福祉是国家实现生态文明的出发点和归宿。柯布认为美国政府更注重富人的利益,而中国政府仍掌握着私营经济,并时刻关注民生问题,关注穷人的利益,这不仅关系着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关系到全世界^[5]。最后,适度稳定的人口有利于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更利于生态文明的发展。

(四)新的生态模式——共同体经济模式

柯布认为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本质在于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发展生态经济(共同体经济)。他在对原有受实体思维影响的生态模式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一种关系生态模式。生态模式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坚持有机体与环境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有机体的一部分是由环境决定的,在不同的环境中,即使是同一种有机体也是有差别的,所有的有机体都与其环境有一种必然的联系。生态模式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关系共同体中的个人,同样,生态思维是由紧密联系的关系网络产生的。也就是说,关系并不是纯粹外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是

关系中的人,都是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人类共同体只是生态系统中的小团体,全人类的福祉都与更大的地球共同体相关联^[2]。

新的生态模式(共同体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现今的经济发展只追求生产和消费,而忽略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问题。共同体经济是一种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经济的发展分为城市共同体的发展和农村共同体的发展。从发展范式来看,柯布指出以大城市为主调的城市化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般来说,三万人才是满足环境需求和能源需要的合理的城市规模。在这种规模的城市中,居民可以实现食物的自给自足,并使发展生态农业成为可能。教育、健康、交通和政治决策等并不需要更多的成本就可以达成,完善公共设施会减少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柯布认为中国不必走工业化农业的道路,中国乡村应发展生态农业以及劳动密集型农业,实施可持续农耕法。应相信和依靠农民,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以减缓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三、“中国是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论断解读及其启示

近年来,柯布曾多次到访中国,并有过“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的著名论断,这不仅表明他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心,也说明中国具备实现生态文明的土壤。柯布生态文明思想对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是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论断解读

柯布多次提出“中国是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思想上看,中国人民懂得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从文化上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从制度上看,中国的政体和政策都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

1. 中国人民懂得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

柯布认为,中国人创造了《易经》,深谙“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2]。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从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起,中国经历了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的一次次探索,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时至当前,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中

国人民必然懂得生态式变革的重要意义。生态变革以“政治共治、经济共赢、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宗旨,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发展水平与状态互相整合为路径,以人类共同的福祉为目的,实现人民的生命同栖、价值共识、环境共存。只有这样一种生态文明的境界才能真正保证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开始探索新的生态模式,倡导发展生态经济。2015年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由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高精尖的科技环保型产业结构迈进,关闭或者整改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发展科技创新型企业。

2. 中国传统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道两家)背后的生态智慧与当今的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契合。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夫物芸芸”“各归其根”,认为人要按规矩办事,万物生生不息,都要回归到自身的根,这与柯布生态文明理论所强调的关系性有诸多相通之处。道家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念:第一,天人一体,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第二,天人和谐,人与天地万物休戚与共,和谐相处;第三,天人相爱,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也必须在自然的环境下才能生存,所以,人应当爱护自然。这与柯布的生态文明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儒家的“贵和”思想十分重视和谐:第一,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人类与自然互敬互爱,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实现自然界和谐的前提;第三,人本身的和谐,即人的心理和道德层面的健康,是自然界和谐的保障。

3. 中国的政体和政策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发展

柯布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心还源自于中国的国家政策和政治体制。一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6]。柯布肯定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已成全社会共

识,中国政府还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战略任务和基本国策,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见的。这是历史性的一步。”^[7]另一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中国的政治体制善于整合资源,将生态文明建设带入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社会、和谐社会的格局中,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从整体上来把握政策的发展方向,从而更有利于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

(二) 柯布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柯布以其整体有机、和谐发展、事件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彰显着指导性意义。只有发挥中国特色,才能促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发展生态农业,才能稳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只有坚持完善相应的制度,才能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只有重视公平和正义,才能发展生态经济;只有将生态模式推广至城乡,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进行创新,要着眼于当前中国的国情,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首先,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对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以生态文明建设辅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次,对柯布生态文明思想的借鉴和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创新离不开我国传统文化这一根基,要善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经验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革故鼎新。再次,要坚持群众路线,把握人民群众的利益。柯布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是共同体中的人,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福祉。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首要任务是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强化人们的生态思维,依靠群众解决现实生态问题。

2. 加强生态立法和环境执法

柯布认为,中国将生态文明放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十分有利的事。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环境制度并不完善,仍需加强生态立法和环境执法。十八届四中(下转第71页)

云贵一带迁来立村而得名。

陈家坡子，相传建村于明初，由吕、陈两姓从云贵一带迁来立村，后陈为主姓，因地势低洼，常积水成泊而得名。

当前学术界对云南乌撒卫进行讨论的主要有曹树基和谭雨明。曹树基以崂山县城阳乡为例，通过分析乌撒卫所在地，指出“云南乌撒卫”中的“云南”就是今日的云南省，并且这部分移民迁入的最大可能是军卫调动^{[1]196—19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谭雨明以今云南省没有“小云南”的记载和民间族谱中关于“山东小云南”的记载而否定“小云南”即云南省，并认为“小云南”指以即墨鳌山卫为中心的今青岛沿海地区^[2]。他认为“小云南”为鳌山卫代称的前提是承认集结在此地的军户来自云南。据此民间族谱中关于“山东小云南”的记载中的“小云南”与第一代从云南迁到此地者所指称的“小云南”的意义已经不同，前者是为纪念山东某地，而后者是为纪

(上接第53页)全会已然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大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如随着2016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出台，相信以后我国的空气质量会得到更加严格的监控。在现阶段，应提倡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社会各界承担环境责任，更加合理地利用生态资源，建立整体有序的生态市场。还应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突出政府在生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3. 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经济

根据柯布的观点，农村社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发展共同体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要手段。一直以来我国都十分重视农村社会的发展，习近平同志更是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要发展生态农业首先要提高全体农民的知识水平和科学素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使农民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明确个人、家庭、村庄与国家是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其次要鼓励农耕文化与新农业科技相结合。我们要明确认识到中国农村社会应扎根于土壤中，提倡保持中国独有的小农场农业，减少对机械工

具的使用，不再使用化石燃料，用有机肥料代替化学肥料，保证农产品的质量，满足地方共同体的日常生活需求。在中国，只有推动分散化、地方化的共同体经济，加快对中小城镇的建设，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综上笔者认为，“云南乌撒卫”中的“云南”当指今日的云南省，所谓“小云南”只不过是这些迁到此地的军户对云南省的代称。

参考文献：

- [1] 曹树基. 明时期[M]//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第五卷.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2] 谭雨明. 小云南与明清移民[J]. 寻根，2003(5):125—129.
- [3]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878.
- [4] 韦庆远. 明代黄册制度[M]. 北京：中华书局，1961:22.
- [5] 何炳棣.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M]. 葛剑雄，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2—13.
- [6] 孙鹏. 明朝初期即墨移民初探[J]. 崂山春秋，2007(17):31—33.

(责任编辑：白丽娟)

具的使用，不再使用化石燃料，用有机肥料代替化学肥料，保证农产品的质量，满足地方共同体的日常生活需求。在中国，只有推动分散化、地方化的共同体经济，加快对中小城镇的建设，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柯布，樊美筠. 现代经济理论的失败：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全球金融危机——柯布博士访谈录[J]. 文史哲，2009,(2):10—15.
- [2] 刘志礼. 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选择——第五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综述[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638—644.
- [3] 任平. 呼唤全球正义——与柯布教授的对话[J]. 国外社会科学，2004(4):80—82.
- [4] 小约翰·柯布，董慧. 论生态文明的形式[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4—9.
- [5] 约翰·柯布，吴兰丽. 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615—618.
- [6] 万俊人，潘家华，吕忠梅，等. 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笔谈[J]. 中国社会科学，2013(5):204—205.
- [7] 柯布，刘昀献.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教授访谈录[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3):5—10.

(责任编辑：白丽娟)